

# 全球化时代和政论史诗《建国大业》

倪 震

**摘要：**《建国大业》以浓缩的篇幅和政论性电影语言，以当代和历史对话的方式描述了1949年这一历史性转折中的政党活动和各派政治力量的较量，重点描写政治协商、民意为主、立法建国的主题，表达了全球化时代与建设和谐社会、确立和平发展方针的时代精神密切呼应的话语。作为视野广阔的影像史记，《建国大业》突出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等与民主党派代表人物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历史行动，刻画了跟随中共建立民主政权的民主党派领袖和进步人士为实现民主建国理想鞠躬尽瘁、不惜牺牲的感人形象，对蒋氏父子，也给予了当下话语环境中的重新审视。明星的全力参与，历史内容的情节奇观化和视听震撼化，视听语言的柔性化、幽默化和诗情化，则成为《建国大业》适应文化产品市场竞争需要、实现政治娱乐化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全球化；政治娱乐化；历史与当代对话；诗化电影

**作者简介：**倪震，男，教授。（北京电影学院，北京，100088）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8-6552 (2010) 01-0043-05

《建国大业》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影片。它既是对中国人民奋斗史和胜利史的再叙述，也是改革开放30年后，国家形象银幕化的跨越性突破。这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已经取得重大经济成就、又广泛而深入地进入国际社会的时刻产生的一个具有现代文化意义的电影事件。《建国大业》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全球化时代的一次当下现实与历史伟业的对话；是国家在民众心目中历史必然性与合法性的证明；是民族历史怀旧注入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的文化转型。

1989年的《开国大典》，1999年的《国歌》，都是那一个十年大庆时，中国电影人所奉献的国庆大片。它们都清楚地刻印下当时国内外政治文化环境导致的文化印痕。《建国大业》明显地与那两部影片拉开了文化视野和电影创意上的距离。“‘历史’在今日之所以有价值或者被关注，是因为它与现实之间能够建构起一种对话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借助文字或影像去‘复原’历史。”<sup>[1]</sup>

## 一、国家合法性的当代与历史对话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取得了高速发展和国泰民安的显著成就。“中国在2005年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它的GDP到2008年将超过德国，2030年前超过它的邻居和对手日本，中国正为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提供资金，而30年后它将超过这个第一世界强国。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助于其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有利于其进入多边体系和接受市场经济规则。”<sup>[2]</sup>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发展、社会改革、民主建设和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的成就，已经从外部世界最初抱有的怀疑、敌视、担忧和遏制，逐步走向关注、认同、合作甚至充分研究的现状。美国原商务部副部长罗伯特·夏皮罗指出，美国、德国、日本甚至韩国，都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寻找到最适合本国的工商业发展路线。无论哪个国家，实现这些目标都花了很长时间，有的甚至长达几个世纪。“唯独中国的飞速进步不能归功于这种正常而缓慢的经济发展，而应该归功于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政治决策。

在这个方面,严格来说,中国的最大优势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中国一直保持威权体制,领导层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和决策能力,也能得到社会的普遍拥护。”<sup>[3]</sup> 罗伯特·夏皮罗进一步指出:“中国向市场机制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中国领导人战略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目标就是摆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途径就是推动经济增长,进而增强国家实力。”<sup>[3]</sup>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在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领导和团结中国人民按照科学发展观,以建设和谐社会和贯彻和平发展的方针,朝着实现小康目标扎实迈进,取得了全体国民的拥护和积极响应,产生了同心同德、发奋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动力,体现了国家政权的充分合法性,真正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而民族国家之所以能迈上这条康庄大道的源头和出发点,正是《建国大业》所描写的 1949 年的历史转折所奠定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合法性和历史进步性。没有 20 世纪中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各民主党派、各阶级群众打倒独裁的蒋氏政权,完成历史性的建国大业,便没有 60 年来建设现代国家的独立主权、国际地位和强大经济基础,便不可能形成今日中国崛起于全球化时代、跻身于强国之林的伟大成果。

“中国希望从 19 世纪西方通过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以及中日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和随后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衰退带给中国的屈辱当中合法地恢复其历史上的千年辉煌和强大地位。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经济蓬勃发展,这种雄心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似乎是可以实现的。这种前景引起了华盛顿和东京的担忧,它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千年焦虑。”<sup>[4]</sup>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今天,不止一位西方政治学者从政权合法性的角度来讨论和展望中国社会的发展前进和国际责任,实际上是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公民身份”的正视和承认。“现代中国人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发展的付出,就是一种对于自己的‘国’的公民身份的强烈渴求。《建国大业》所表现的就是‘旧中国’已经无法建构的一种公民身份。……因此,‘新中国’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新的中国人的‘公民身份’这样的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新中国’对于国家自主性的强烈的追求才使得‘新中国’能够获得最广大的人民和中国主要社会力量的高度信任和支持。”<sup>[5]</sup>

影片《建国大业》以浓缩的篇幅和政论性电影语言,以当代和历史对话的方式描述了 1949 年这一历史性转折中的政党活动和各派政治力量的较量。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阶级民众战胜蒋介石独裁王朝的三大法宝是:一、共产党的领导;二、人民军队的武装斗争;三、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群众的统一战线。《建国大业》着重描写的,是人民军队摧枯拉朽地击溃国民党军队的大转折时刻,中共领袖们真诚、周密、全面地策划各民主党派、各阶层民众团结一心地共谋人民民主建国大业的历史进程。影片充分地展示了对民主党派领导人政见的尊重、人身的关心爱护;对多党派政治协商的民主性和合法性的充分发扬。

而与此相反,蒋介石独裁政权由于代表极少数官僚资本阶级利益,坚持家族独裁的统治,发动内战,违反民意;压制民声,屠杀民主人士;否决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全民政治主张,召开孤家寡人的伪国大;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危机下,家族成员仍然狂吞民间财富。这一切,造成了国家政权陷入了全民反对的非法性泥潭之中。蒋氏独裁政权在 1949 年完全处在了王朝末日、行尸走肉的绝境。《建国大业》运用全景式、多视点的电影语言,在以往一系列以描写战场决胜、逐鹿千里的历史片的基础上,转而重点描写政治协商、民意为主、立法建国的主题,表达了全球化时代与建设和谐社会、确立和平发展方针的时代精神密切呼应的话语重构和宏观视野。

## 二、历史人物的民族代表性和历史使命感

《建国大业》是一部视野广阔的影像史记,描写了民族命运转折关头各种政治力量代表人物的政治理想和人格特点,尤其突出了跟随中国共产党共同建立民主政权的民主党派领袖和进步人士的历史形

象，着重刻画了他们为实现民主建国理想的献身努力，描写了他们不畏强暴、以身报国，为新中国的诞生鞠躬尽瘁的历史足迹，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民族精神。

当然，《建国大业》首先还是以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的历史形象为核心，作为这部政论诗篇的中心人物来展现。但是，这一次的历史叙事，不以毛泽东雄兵百万、决胜千里为一贯的焦点，而以突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民族历史转折关头，以海纳百川的胸怀，领导统一战线、与民主党派代表人物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历史行动为重点，来展现他们的民主精神和人格力量。

在《建国大业》中，毛泽东河北城南庄空袭遇险、淮海大捷酣醉中与战友共欢的场面，固然是银幕上前所未见的华章，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因冯玉祥遇难而悲恸激越、为张澜身处危境而忧心如焚，更是本片突现毛、周人格力量的要义所在。至于专程委派邓颖超南下或邀宋庆龄共商建国大计，毛泽东亲临北平车站，登上专列迎接宋庆龄的场面，更是《建国大业》的闪光之处。在这些段落中，不仅表现了中共领袖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命运与共的历史事实，更是突出了毛泽东、周恩来诚信天下、情谊千钧的人格力量。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中华传统，立党为公、以德建国的现代展示，很自然地引发中国观众的历史回忆和心灵共鸣，也是政权合法性的生动的道德展现。

《建国大业》以简练的笔触和铿锵的节奏，描写了闻一多为民主权利慷慨陈词、喋血江城的诗人气度；刻画了冯玉祥布衣护民、仇视黑暗的悲愤绝望。但是，用详尽的篇幅叙述的，是张澜年近多病、孜孜以求坚持民盟的民主立场及合作中共的进步方向，突现了这位四川老革命家的铮铮铁骨；又以写实的笔法，刻画了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矢志反蒋、又忧虑往日恩仇的矛盾心情，在导致政局急转直下的历史关头，犹豫不决、忧心忡忡的痛苦抉择。这些篇幅不仅反映了中共实现统一战线过程中的艰难曲折，也反映了各种历史人物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个人性格和政治选择的艰辛。历史巨变中的重要人物走向新岸，并不如旧帜落地、新旗升空这样简约明朗，而是交织着纷繁复杂的历史纠葛和恩怨悲喜，伴随着欢乐和辛酸的泪水，跨入崭新的历史阶段的。

而描写民主进步的历史人物中，刻画宋庆龄的篇章，是《建国大业》中历史再现和美学追求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段落。许晴扮演的宋庆龄，赋予了这位20世纪中国杰出女性以高贵的精神力量和优雅的气质，形成了与本片追求的文化品格和当代意识十分契合的美学目标。《建国大业》调用多位明星而不追求与历史人物形貌相似，虽然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但神似寓于形似仍旧是历史史诗片重要的达标指数。许晴以其独特的形貌相似优势，加以精湛的表演技巧，出色地塑造了20世纪40年代的宋庆龄形象，成为历来描写这一历史人物的影片里最为成功的一次。宋庆龄形象在本片中的塑造，以中国女性高尚、圣洁、庄严为特点，达到了继承孙中山民主革命遗志的精神化身的境界。在面对李宗仁的参政请求和党派图谋面前，她坚定而从容的拒绝；在接待邓颖超北上邀请的谈话中，平静而欣慰的允诺，都优雅适度、沉稳内敛。特别是解放军攻占上海，宋庆龄清晨漫步，目睹战士们不入民宅，沉睡路边的景象，触景生情，百感交集，达到了重叙历史，意义更新的思想境界。

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席地而眠不扰民宅的感人行动，在以往的中国电影里不乏先例，对中国观众而言，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景象。然而，把人民军队这一秋毫无犯的护民行动跟宋庆龄清晨漫步结合起来，以幽远、柔美的电影音乐，组成诗情语言，创造了“历史与人”的诗学高度和美学意境。通过宋庆龄的内心感悟和历史想象，引发了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建立，几代中国人前赴后继，不畏牺牲，为民主独立的建国抱负而献身的联想。

《建国大业》对于蒋氏父子的描写，也赋予了既还原于历史处境中的亡国之痛，又给予了当下话语环境中重新审视的特点。尤其是影片中蒋经国形象的刻画，既突出了他忧党忧国，苦心孤诣力挽狂澜而终于失败的无奈，也反映了他处事严肃、事必躬亲的个人品性；历史叙事赋予悲剧人物以真实的历史遭遇和性格描写，才能获得文化意义而不是宣传意义上的人文价值。“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建国

大业》对于蒋氏父子的描写，有别于以往同类影片中的艺术处理，也体现了海峡两岸政治形势的当代变化和全球化环境下中国国家形象与时俱进的重述要求。

### 三、政治娱乐化的电影语言探索

全球化时代的传媒一体化和文化产品商业化，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眼球经济”不可阻挡的趋势，决定了一切文化产品在严酷竞争的环境之中，无法回避文化市场的激烈博弈和稍瞬即逝的取胜机遇。政治性文化话语的公众接受，照样离不开竞争形势。欧美政治家们的竞选行动本身已变成一场娱乐化的“作秀”，更不必说反映政治内容的文化艺术产品的娱乐化语言锻造。没有适应当下受众要求的话语方式，也就失去了使受众响应政治主张的前提。中国主旋律电影通过官方操作和红头文件组织观看的时代也已成为历史，《建国大业》是政治娱乐化探索的标志性事件。

《建国大业》政治娱乐化语言的第一个方法，是一百七十多位明中国电影明星的全力参与，使这部影片历史内容的宣示，嫁接在中国观众熟悉和喜爱的明星表演身上，形成了追捧中国明星登场和品位他们个人风采的轰动效应。从某种意义上，也达到和扩展了历史和当代对话的效应。

要想让 80 后和 90 后的观众抱着极大的兴趣走进影院去回味历史叙事和领袖人物的重大决策，沿用惯常的创意和运作方式是很难奏效的。历史时尚化和政治娱乐化是实现电影产品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必要手段。或者说，没有市场效应也就空言社会政治效应。“先要有人看，才能让人想”，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明星群体性登场既实现了历史和当下的对话，也实现了内容和观众的对话。

当代观众观看和接受由明星扮演的历史人物，在欣赏需求和接受心理上，满足于当代明星/历史人物双重认同，完全不同于往昔历史片观赏中，要求演员化身为历史人物的审美追求。“观看明星”成为“观看历史”的欣赏前提和进入剧情的“入口”。观众宁可找到保持本来面目的明星，以获得识别偶像的快感，也不需求他酷肖剧中历史人物的原型。文化消费方式的更新，买方市场决定性指向的确立，改变了电影历史叙述和审美原则的传统。张国立拒绝用化妆技术改变他的容貌以接近蒋介石的形象；陈坤保持个人本色，与蒋经国的容貌相去万里。观众高兴地认出姜文穿上军服而原型不变的潇洒风采，李连杰和黎明、章子怡和黄圣依不化身于角色，而留给观众茶余饭后议论不绝的消费快感。这正是明星群体汇聚历史场景的创意策划的决胜谋略。它和 90 年代初期，历史片《周恩来》的扮演者王铁成，为了再现晚年周恩来在文化革命逆境中的沧桑容貌而饥饿减肥、演员自身也备受煎熬的艺术处境，有天壤之别。

笔者认为，172 位明星参与《建国大业》的聚会，有如一只手表上镶嵌了 172 颗钻石。一只普通的、主要功能是计时而用的手表，市场价低则数百元，高则几千元即可购到。但是，当它镶上三十颗或者四十颗钻石时，这只手表就升高到价值二十万元甚至四十万元。然而，它此时的价值，已不再是实用的计时功能，而是转换成手表佩戴者的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比喻未必准确，却也耐人寻味。

《建国大业》的政治娱乐化语言的第二个探索，是历史内容的情节奇观化和视听震撼化。这既是诗化政论的样式需要，也是适应当代观众娱乐化需要的创意定位。

《建国大业》片长二个多小时，尽管它已大大超过了标准的电影放映长度，但仍然不能以故事化方式完成大容量历史叙事，必须也只能用诗化叙事、广角视点、点到为止的方式，来完成建国进程的历史再现。因此，在叙事进程中，放弃因果严密的故事化线索，铺展全景式推进的多视点叙事；在人物刻画上，舍去前因后果的过程性描写，采用奇观式瞬间完成人物刻画的手法，是《建国大业》的特点。例如：闻一多受难、冯玉祥护民的场面，都是点到为止，立显人物性格，瞬间完成人物描写的任务。又如：毛泽东城南庄遇险；周恩来因冯玉祥遭难而暴怒的场面，也都是不事铺垫，突发主人公惊险境遇的叙事策略。至于张澜险遭国民党特务劫持，幸得中共地下党救援；宋庆龄清晨漫步目睹解放军入

城的感人场面等，也都是非因果性叙事却强化点状情节奇观的典型例子。

政治娱乐化电影语言探索的第三个手法，是视听语言的柔性化、幽默感和诗情化。

《建国大业》政治历史叙事的重点是解放军胜利进军、党中央统揽全局、立法建国的和谐内容。因此，电影语言的柔性化明显有别于《大决战》等军史影片的刚性化策略。在若干战争场面的展现中，常常用声画分离的手法铺以诗情音乐，表达战斗超越了史实再现的具体层面，进入胜利者以情叙史的咏叹语调和谐象征境界；淮海战役大获全胜的重大军事事件，几乎没有战场实况的描写，却强调了毛、周为首的中共领袖们酣醉的激动和抒情音乐的烘托，突现了革命终于成功、人生终需狂欢的柔性化语言的政治意境。

与此同时，政治娱乐化的语言构筑，也体现在声画组合的幽默感、喜剧性的渗透之中。幽默感和喜剧式语言的历史表述，是审美当代性、历史距离感和叙述人格化的具体表现。只有政权稳定性、历史合法性达到十分自信、政治胸怀相当广阔的叙事者才具备这种文化品质。这也是每一个十年国庆大片与时俱进的现实根据和历史重叙的原因。《建国大业》中，西柏坡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时，面对神态各异的中共领袖们鱼贯进入会场，伴以幽默、逗笑的现代音乐的场面，把一场十分庄重的历史性会议置于欢快而轻松的节奏中一气呵成，体现了历史事件现代性重构的鲜明意识。在离开当时 60 年的时间距离上，当代观众早已牢记毛泽东郑重叮咛夺取城市胜利后应该警惕的各项挑战，更需要感受的是胜利者的历史自信和 21 世纪新长征路上的精神准备。

60 年的时光已经过去，几代人亲身体验了胜利和曲折的艰辛与悲欢。“一切历史的都是当代史”，《建国大业》在叙述内容和叙事方法上实现了全球化时代的双重跨越，形成了历史与当代的合理的连结。中国电影通过这一生动事件的演绎，标志着主流化叙事正朝向广大受众关注的未来扎实跨进。

#### 参考文献：

- [1] 陈晓云. 政治诉求的现代表达——从《建国大业》现象说起 [J]. 当代电影 2009 (11).
- [2] [法] 罗朗·柯恩-达努奇. 世界是不确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 [M]. 江苏：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8.
- [3] [美] 罗伯特·夏皮罗. 刘纯毅译. 下一轮全球趋势——决定你未来 15 年的世界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160-161.
- [4] [法] 阿兰·佩雷菲特. 当中国觉醒的时候 [M]. 巴黎：Fayard 出版社，1973.
- [5] 张颐武. 《建国大业》：国家合法性的庄严表达 [J]. 当代电影，2009 (11).